

說 明

一九五三年三月軍委總參召開戰史編寫工作會議，確定東北軍區負責編寫東北抗聯鬥爭史。軍區根據總參指示，在本年四、五月間即着手抽調幹部，建立機構（充實經驗研究科），進行工作。但因幹部太少、能力弱、無經驗，加上材料缺乏，工作遇到許多困難。雖然多方探訪、搜集、調查、翻譯，費時約一年，所得材料很少。後在總參幫助下，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邀請原抗聯部分負責同志馮仲雲、王效明到瀋指導和協助搜集材料。由馮、王的幫助，在前東北局組織部借到「東北地下黨及抗聯問題的參考資料」十四集，約二百八十餘萬字。在這材料的基礎上又盡力搜集抗聯有關材料，彙整一抗聯歷史資料。爲以後編寫鬥爭史準備條件，並擬訂出搜集材料，審閱文件，組織寫回憶錄、彙整、打印抗聯歷史資料的工作計劃，並基本按計劃完成了任務。

爲了便於編寫抗聯鬥爭史同志對此資料閱覽與研究，現將「抗聯歷史資料」的材料來源，對材料的研究、取捨的過程、彙整的方法、現存問題分述如下：

材料來源：我們在搜集材料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一、抗聯當時所處環境極端殘酷、緊張，又沒有鞏固的根據地，經常處於戰鬥的情況下，部隊流動性大；特別遇到敵人「討伐」，部隊的流動性更大，戰鬥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下，爲了保密，有關抗聯的歷史文件，大部份自行焚燬、掩埋、或失散，現存原始文件極少。

二、在我們搜集材料之前，我黨中央及朝鮮勞動黨中央、東北局進行過搜集，有價值材料已被搜集殆盡；就是一般性質的材料大部亦被收集去了。在材料的來源是極端缺乏的，因此，我們確定以東北局原搜集的材料爲基礎（採用與抗聯鬥爭有關主要部分），組織抗聯幹部寫回憶錄，收

集抗聯負責同志有關抗聯的報告、演講、書信、日記等文件，摘錄已經出版的有關抗聯的書報，翻譯敵偽文件。現在的「抗聯歷史資料」，就是由上述幾部分材料彙集而成的。

對材料的研究。在取捨材料過程中所遇到以下困難：

一、工作幹部未參加過東北地下黨及抗聯鬥爭，不了解當時情況，又加水平不高，歷史知識缺乏，難辨別材料的主次、輕重、是非。

二、大部分材料是來自敵手，有的文件會經過幾種文字反覆譯印，（如：過去東滿黨將某些文件譯成朝鮮文，日寇徵獲之後又將朝鮮文譯成日文，我們又再將日文譯還中文），在翻譯過程中敵偽是否篡改，翻譯是否有誤，現無原始文件查對，真偽難辨。

三、中央對抗聯歷史未作結論，故我們沒有分析、批判歷史資料的依據。

四、抗聯幹部所寫回憶錄、日記、報告、和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大都限於對抗聯一般情況的敘述，特別是回憶錄中抗聯主要負責幹部寫的少，只是當時的一般下級幹部寫了十餘份，內容零碎，缺乏系統，都是對一般瑣碎事實的記載，缺少分析批判，涉及到政策路線、建軍原則問題的極少，參考價值不大。經首長指示和徵詢抗聯個別負責同志的意見後，確定我們解決上述困難的辦法是：以我們現有水平和對抗聯情況的初步了解，決定對抗聯材料的取捨。當然，這樣做可能產生對材料的取捨不當，輕重倒置，主次不分的毛病甚至錯誤。根據工作幹部的具體情況，爲了少犯錯誤，我們規定的取捨材料的基本原則是：除大體上按照材料的主次決定留去外，對能留材料的文章一般不加任何變動、批語，只是對個別字、句略加修改，以利文理順暢。現在這個近二百萬字的「抗聯歷史資料」，就是根據上述原則整理而成的。

彙整的方法：我們採取了以下四種方法彙整的：

一、按照文件的先後歷史順序編排。

二、在文件歷史順序的基礎上，以東北黨及抗聯的歷史發展情況，劃分為四個階段：「九·一八」以前的時期；「九·一八」以後至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九三」。

三、分主次編排：以國際和中央對東北黨及抗聯的指示、決議、和東北黨及抗聯的指示、決議、報告等文件為主文；以抗聯幹部的報告、講演、日記、著作、回憶錄等文件作為附錄一；以敵偽對我黨、我軍的「治安肅正」文件作為附錄二；敵偽對抗聯編制、作戰活動情況反映作為附錄三。

四、按歷史順序和歷史級段分集。總集數按一至九集的順序排列。其中每集之大小是由階段內之材料多少決定的。集不跨階段。因此各階段所包之集數不等，有多有少。例如：在「九一八」以前時期只包括第一集，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後至一九三三年則包括二至四集。這樣就能使材料集中，便於查閱。

現存問題：在研究、彙整材料中間，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提出來，供將來編寫門爭史的同志們參考：

一、材料不足，真偽莫辨，這是應該特別注意的。因為：第一、現有材料只是抗聯原始文件極少一部份，並且內容瑣碎，沒有系統，有關黨的政策路線，建軍原則等關鍵性問題的文件很少，遠非夠編寫門爭史的資料。第二、現有資料大部來自敵方，須辨真偽，方能採用。第三、我們彙整的資料是以前東北局的材料為基礎的（我們採用了有關抗聯鬥爭的主要部份），但前

東北局特派幹部向我們聲明：他們的材料因負責編寫的同志缺乏認真嚴肅的工作態度，有些材料未辨真偽盲目採用，並且對歷史情況不了解，過早下結論，草率從事，致使犯了錯誤。因此向我們提議：他們的材料未經審查以前，如作為編史資料，必須慎重。

二向抗聯幹部採訪中間，發現抗聯幹部之間在對抗聯的估價、勝敗論定、建軍原則、統一戰綫、農民問題、根據地建設、部隊人數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存有分歧。在正式編史以前，必須弄清史實，求得在抗聯幹部中統一思想，方能達到總結經驗、教育幹部的目的。

三中央對抗聯歷史未作正式結論，對某些原則問題的是非論定有困難。因此，待中央對東北黨及抗聯的歷史作了結論之後，着手編史較妥。

此外，根據我們在一年半工作中的初步體會，認識到編史是一項特別艱巨而又細緻的工作。而且抗聯歷史又非常複雜。做好這一工作，必須有充分的史料，長期的時間，足夠的稱職幹部，特別是須有抗聯的主要幹部參加編寫，方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東北軍區司令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 於瀋陽

第九集 目 錄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

侯啓剛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會的聲明辯書(譯文)(一九三九年舊曆三月二十日).....	一
三軍許 亨植給姜國長趙主任的指示信(譯文)(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七九
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許亨植給該軍政治主任張蘭生的信(譯文)(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	八〇
原下江特委書記黃成志關於下江工作情況的報告與意見(譯文)(一九三九年).....	八四
中共北滿省委代表許亨植給龍江工作委員會的指示信(譯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	九五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創刊號(譯文)(一九三九年六月廿七日).....	一〇一
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政治責任與布爾什維克鐵的紀律.....	一〇一
北滿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通過第一號——關於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的成立.....	一〇九
北滿省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給三軍黨委的通告.....	一一一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第一號(譯文)(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	一一三
總政治部撤消侯啓剛同志工作決議.....	一一三
壽、金策、亨植給省委的信.....	一一八
北省執委第二次命令開除侯啓剛黨籍決議.....	一二〇
侯啓剛給周保中指摺同志的信.....	一二〇
侯啓剛給金策主任的信.....	一二三
北滿抗日救國會緊急通告(譯文)(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一二六
第三軍政治部主任張蘭生給三軍二師師長宋仲鶴的指示信(譯文)(一九三九年舊曆八月)	

廿八日		一三〇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第二號（譯文）（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		一三二
北滿省委回答金策同志意見書		一三二
三路軍總指揮張壽鏞給姜團長王指導員和全體同志的指示信（譯文）（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		一四四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部告降隊書（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一四六
抗聯三軍三師代主任趙敬夫給紫英、王有兩同志的指示信（譯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四八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第三期（譯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四九
高崇民致六軍第一師政治主任徐光海同志、十一軍政治部主任張興德同志、姜旅長賈林同志崔主任震寰同志及下江三、六、十一軍全體同志		一四九
中共北滿省委第十次常委會告全黨同志書（譯文）（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六一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第四期（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一六八
第三軍政治部關於反奸細鬥爭		一六八
對於高崇民同志意見書中若干錯誤觀點的批評		一七八
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部訓令（譯文）（一九四〇年）		一八一
中共南滿省委書記兼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副軍長魏拯民同志致關內第八路軍的聯絡書		一八二
係信（譯文）（一九四〇年）		一八二

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東北抗聯第一路軍副軍長魏拯民同志給中共代表的報告（譯文）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八四

北滿省委給各獨立游擊隊黨支部的通知（譯文）（一九四〇年）……………二〇二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紅五月專號（譯文）（一九四〇年五月）……………二〇三

北滿省委紅五月通告……………二〇三

張爾生同志的聲明書……………二〇一

爲健全黨的組織而鬥爭……………二一三

張爾生同志對羣衆工作的意見……………二二三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第七期（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二三〇

關於「七七」和「八一三」抗戰三週年紀年的通告……………二三一

平原游擊和我軍之任務……………二三五

東北抗日聯軍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同志來信……………二四二

北滿黨的統一與小資產階級反黨份子的脫化墮落……………二四三

郭鐵堅同志的聲明書……………二四八

吉東黨馮仲雪、壽鏡、蘭生等關於趙倫志請示留黨事來信……………二五〇

中共南滿省委書記兼東北抗聯第一路軍副軍長魏拯民同志致康生同志信（譯文）（一九

四〇年七月一日）……………二五三

北滿省委機關刊物「統一」九月號（譯文）（一九四〇年九月）……………二五七

英勇抗戰三週年和我們目前的任務（于天放）	二五七
關於糾正于天放同志論文錯誤觀點的補充意見	二六一
關於趙尚同志黨籍問題的回答信	一六五
金策同志給戴洪濱同志的回信	二六九
金策致周保中同志及吉東黨全體同志信	二七四
壽鏡同志給鴻賓同志的信	二七六
壽鏡同志給××（金策）同志的信	二七八
仲雲同志給金策同志的信	二八一
啓剛「我的路線的實質」	二八二
抗聯第三路軍十二支隊部訓令第五號（譯文）（一九四〇年十月八日）	二九七
抗聯第三路軍十二支隊代理支隊長徐澤民和政治委員韓玉書聯名給中共北滿省委書記	
金策同志的報告（譯文）（一九四〇年舊曆九月一日）	二九九
三肇工委負責人高吉良同志向中共北滿省委的報告（譯文）（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三〇〇
張壽鏡、金策給許亨植同志信（譯文）（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〇三
張壽鏡給許亨植的秘密指示信（譯文）（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〇六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龍南黨的具體任務（譯文）（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〇九

中共北滿省委民衆武裝提綱（譯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一三
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給第二支隊劉雁來的指示信（譯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日）……………三一七

侯啓剛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員會的聲辯書（譯文）（一九三九年舊曆三月廿日）

親愛的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員會：

當我接到了金策同志轉給我省委的信，告訴我可以提出申訴時，我當時就準備寫信，但突然聯軍總政治部主任張壽錢及西北總指揮許亨植同志又提出了聯軍總政治部「撤銷侯啓剛同志工作的決議」，由省常委金策同志主持，召開兩次對我的「批判質問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因為我對吳平論文及北省決議，又提出了不同意見，所以他們（金、張、許）代表省委，撤消了我的七軍政治主任工作。因此我決意一方面給中共中央寫意見書，一方面向省委提出申訴書，以表明我的一切。

我原來只想就省委對我的批評及在聯軍總政治部決議中所指出的我的所謂錯誤加以片面的申訴，但竟又接到（舊曆六月二十二日）省委的信，因為要我在申訴書中包括我的觀點、方法、立場、工作方式、歷史等，所以我才不得已變更了原定方針，大膽聲辯一切。

我的出身是貧農（土地十三畝「每畝二四〇弓」，房子三間半，共五口人）。一九一五年（九歲）入奉天省蓋平國民小學。一九一八年寄居在營口母親的祖父家中。一九一九年（十三歲）考入營口省立水產學校。一九二二年（十六歲）春在奉天北方三面船萬巨恒學生意，同年冬季回營口。一九二三年夏，在營口晉德隆學生意。一九二四年春，入遼陽滿鐵設立的商業學校，五卅事變（十九歲）時，因鼓動罷課未果而退學。回營口後入私塾讀四書，詩經等古文。一九二七年七月，入奉天張作霖所設之模範隊，一九二八年春，因病（即今之痲瘋質斯）由模

範隊退伍，五月爲向龍江省伯父要學費，在旅途中於長春巧遇營口水產學校當時的同學王某（國民黨員），經吉林國民黨省執行委員會介紹，到南京投考國民黨中央黨校，但沒被錄取，九月同吉林，在國民黨吉林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任職，被委任爲秘書。這是一九二八年，從這時一起，開始了我的政治生活。

在半年的工作中，我才知道國民黨內幕。一九二九年（二十三歲）春，國民黨在五中全會後，不僅內部愈爲分裂，而且暴露了公然收賄的醜態。三月赴上海，本意擬入大陸大學，但因已閉校，遂於同年冬入華東大學。因學費不足，於舊年底來到北平，遇見了前國民黨吉林省執行委員王文賢（前國民黨北方大同盟派），在那時我借來了關於馬克斯主義的書籍，耽讀了半年。一九三〇年夏，爆發了閻馮戰爭，汪精衛在北京召開了國民黨擴大會議。當時北方大同盟接受了閻錫山的意見，組織了國民黨各省市聯合辦事處，我在該處擔任組織部工作約三個月。大同盟派內有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組織，我也參加從事研究。以後該會發起人給我一份「工農黨宣言」，繼而又允許我看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宣言，不久又由他們介紹，參加小組，只開過一次會。在會議中，我曾提出質問：「工農黨和共產黨不同之點？工農黨的理論？共產黨不也是代表工農的嗎？」（當時我還不知道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他們未能回答。只回答稱：先建立新組織，理論基礎尚未系統地創造。不久，張學良進關，閻錫山敗退，遂不得已而解散，我因患瘰癧質斯，臥病一月有餘，王乃派朋友將我送回營口。那時是一九三〇年，是紅軍逮捕范鐘秀，進攻長沙的那一年。

在營口臥病中，從報上知道了紅軍的勝利。我寫信給王某，詢問工農黨的情況，並順便說

我在一九三一年春將赴上海。王同信說「托君來信說「組織已解散」」過去我就知道該組織理論家是施存統，劉凱元等，但他們已通過大同盟派從閩錫山處接受了一萬餘元做資金，在上海開春秋書店。這時我才知道工農黨是托陳派。

一九三〇年底，楊波（前滿洲省委的叛徒楊波）從上海來信說：「已參加共產黨青年團，因他家寄錢較多，足夠二人生活。」慫恿我到上海去。楊波是營口人，我十九歲時就認識楊波，有深厚的交情，因此於一九三一年春我又到上海去了，生在吳淞市中國公學附近，經楊波介紹參加了中共黨支部，正式開始了黨的生活。

不久，調上海街道支部，是年秋因病在吳淞海濱醫院住院，「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出院，又調中公，多季因病惡化，要求組織停止我的工作，雖經批准，因楊波懷疑，仍繼續工作。「一二八」事變爆發時，中公學生全部離校，只剩下黨員和羣衆三千多人。當時在江蘇省委彭同志（湖南省人，一九三四年在哈被捕）領導下，召開擴大會議，彭同志堅決主張不離吳淞。我當時提議到上海去工作，理由是中公及其他各校學生均已離校，吳淞處在戒嚴之下，黨民大部份逃離，因此接近工、農、學、兵甚爲困難。彭同志對我的意見予以嚴格批評，當天夜，彭同志與我個別談話，告訴我在吳淞工人撤退時我們也混在其中撤退，至此我才知道彭同志的意見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談話中，翁照垣部隊一營開入中公，要求我們立即撤退，次日與同志五人一同回到上海。動搖的原因，我以爲第一個是爲了恐懼；第二是癩麻質斯，當時是舊曆年底，病益益轉重；最後是由於政治覺悟不夠。

到達上海的次日，江蘇省委派同志來上海，在法政大學召集我們六人開會，決定每人單

一 備十元，立即趕昆山做難民工作，我很清楚知道，因為組織無暇直接領導，才使每個同志單獨負責工作，如果不去工作，則自然會被組織開除。但在「九一八」後，東北的同學因斷絕了匯款，大部依靠救國會才能生活，所以無法弄到這十元錢。次日只好到社會科學研究所去工作，截至一九三二年舊曆七月，一直在該會工作。

一 在該會工作中，先擔任滬西區總務工作，以後調總會擔任宣傳工作。一九三二年六月，經該會黨員同志的介紹及我寫了請求書，於是與文總馮同志（浙江人）發生了組織關係，但並沒接受金錢的補助。那時楊波被區中央派赴東北，我因生活困難又兼重病在身，故要求回東北養病及找關係，得到馮同志的批准，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回到營口。

一 一九三二年底，楊波因事回到營口，約定一九三三年春赴哈。三月到哈，不久在叛徒劉眼佛領導下，被委為道區區書記。當時這外組織被破壞，二區合併成立市委，遂擔任市委書記。當時住在偏臉子，不意突然受到朝鮮人特務搜查，由於我答辨適當及敵人搜查粗造及幼稚，幸得安然無事，立即報告李同志，藉以停止組織與我的聯絡。歸途受到朝中特務三人跟踪，遂至南崗，通過電業同志會見了劉明佛，不久於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派至珠河黨。

一 一九三四年舊曆正月，滿洲省委要我報告趙尚志同志與珠河黨的衝突，並為我養病，詢我到哈爾濱，到哈後見了彭同志（前江蘇省軍委），以後就養病。不久聽省委交通說楊波、劉明佛被捕，我立即回珠河，擔任部隊訓練工作，秋因病要求休養，得到批准，年底回去。擔任秘書，一九三五年春，代理三區政治部主任，舊曆九月為養病又在哈市南崗市立醫院住院，住了一個半月也沒治癒，遂轉到營口治療，仍沒治好，六月後赴熱河省阜新縣區區醫院

請漢醫治療。一九三六年舊曆二月十五日回到珠海，被派到雙龍隊工作，約一個多月，因失敗而歸隊，不久被總司令部派至軍事政治學校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軍事政治學校解散，被派至嶺西及五師做政治工作。赴任途中與六軍相遇，與該隊一同回來，擔任一師宣傳科工作。同年底調任三師政治主任，因景鴻長（永安）於次年正月越境，一九三八年秋率部隊進出慶城、鐵驢。一九三三年以後，據省委詳知，故只概略加以敘述。

省委對我提出了四條批評：第一：「一九三五年我因病赴哈治療，無論如何，也不能掩蓋當時的動搖。」

對於這個批評，我有意見，我以為這是省委武斷的估計。去年秋，各主要負責同志曾估計我一定率領隊伍赴蘇，但事實並不然。同樣一九三五年秋我赴哈之際，馮同志曾對我說我不會回來，我在當時不僅給予反駁，而在一九三六年春也同樣以與他相反的事實回答了他。現在不也是一樣嗎？省委同志估計在這次問題發生後（即總政治部決議），我一定會不瀟或消極，但我確信這種估計決不正確。我敢斷言北省同志們直到現在還不了解我是否真正掌握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偉大武器，這個武器給了我以偉大的前途和無比的光榮。

我在這裏鄭重聲明：自從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相當認識那一天起，恐怖和對革命工作的動搖對我並不起多大作用。受軍閥影響時，儘管在病中，都參加了軍閥的圈子內（入模範隊）。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時，立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五卅事件時的學潮以及退學）。受到德國流氓壓迫時，雖另外沒有辦法，但至少曾到警察署去接頭（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我自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後，雖由於種種原因，儘管受到數次打擊，儘管在病中，却一面吃藥一面繼續了八年工作，而且經常讀書。然而如果說在激烈的戰爭中我也不恐怖，那確實是騙人，遇

到可怕的事情時我也恐怖，但在事情過後，我的精神却又恢復常態，革命責任觀念，總不離開我的腦海。

因此，「恐怖」在「一二八」事件中，對我曾起了局部的動搖作用，但我想此外再沒有例子的。我想談一下我患病的歷史，獲得理論的歷史及其相互矛盾的關係。根據這個也可證明在一九三五年我要求治療是否動搖。

我的病的根本原因，是因爲在一九二六年夏在私塾時，不正當地解決性慾及傷風而得。秋季右肩下感到疼痛，雖然服藥，但逐漸波及全身。一九二七年在模範隊時，曾經奉天大東醫院及漢醫針靈治療兩月之久，但仍未能治好，因對訓練感到困難，遂脫離了模範隊。一九二八年冬從事國民黨工作時，雖然經漢醫治療，也沒有治好，一九二九年夏，經上海白克路德隆醫院治療並服漢藥，然仍無效。一九三〇年冬，顏面神經痛達數月之久，雖曾入北平協和醫院治療也無效。由於連服漢藥，同年秋顏面及兩腕稍好，然而有轉惡化傾向，乃於同年冬季回到營口。一九三二年秋，在吳淞中公時，因睡床病勢轉劇，曾服用骨痛精天然治毒草，仍未治好。不久，戰爭爆發，犯了應被組織開除的錯誤。一九三二年夏，擔任工作中，沒有藥費，秋季病勢益爲加重，遂回東北。冬季製造藥酒八十斤。一九三三年夏於珠河服用針水，冬季因無效乃燒熱服用，臂及後背化膿，雖曾治了三個月仍無效。一九三四年夏，在軍事行動中，獲得藥品，加以服用，並服用了滿省採購之藥品。冬注射梅毒白靈，一九三五年春服用梅毒白靈，均未治好。到秋季遂要求暫時脫離組織進行治療。這就是省委所說的「動搖」。

有如上所述，一九三〇年以前曾有半年間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一九三〇年秋，顏面病治好，同時精神病稍好，讀書能力乃恢復如常。每次治療期間都成了我讀書的好機會。一九三〇、三二、三五各年冬季，我讀書的時間，至少也有十六個月，一九三一、三三、三四各年冬季，至少也有八個多月。因為我有病在工作上的確造成了重大損失，但從學習理論來看，我想還是得了充分的知識。而且從理論與實際工作相結合來看，可說這實在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截至一九三五年秋我要求治病時為止，我所讀過的書籍如下：「社會科學概論」（大杉榮著）、「費爾巴哈論」（恩格斯）、「反杜林論」（恩格斯）、「史的一元論」（普列哈諾夫）、「馬克思主義幾個根本問題」（同上）、「關於辯證法問題的研究」（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列寧、讀一半）、「史的唯物論」（布哈林）、「辯證唯物論入門」（塔爾哈馬）、「辯證法的唯物論觀」（迭次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河上肇）、「列寧主義基礎」（日譯，斯大林、布哈林合訂版）、「第二貧窮故事」（河上肇著，哲學問題）、「給尤寧迭次庚的信」（迭次庚，哲學問題）、「僱傭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與利潤」、「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通俗資本論」、「經濟學大綱」（河上肇）、「經濟學大綱」（高昌素之）、「馬克思基本理論的發展」（猪俣津南雄等三人，其中包括財政資本論，人口論，土地問題）、「唯物史觀經濟史」（日文，上中下三卷）、「金融資本論」（猪俣津南雄）、「共產黨宣言」（馬克斯）、「帝國主義論」、「凱旋考茨基」、「作什麼」、「兩個策略」（列寧）、「資本論解說」（考茨基）。

關於中國人的著作及雜誌，則沒有必要敘述。史的唯物論，在方法是均衡論。

當然我並不能全部徹底地理解記憶這龐多的書籍，但我相信至少是能理解其大綱的。

這樣，由於理論逐漸深入，病勢轉重，就自然發生了矛盾。就是病要求休息，而革命理

8

論要求工作。因此在秋冬病勢轉重期，診治的要求抬頭，初起因無組織責任，尚可隨時想法

一子，以後在組織上担負責任，就要求適合於治療的工作。然而隨着時間的過去，病勢漸好，理論也強了，工作情緒也越來越高，或積極找關係（一九三二年多丟失關係，此外再沒失過關係，而且也未脫離過工作），或接受組織上的新任務。至一九三四年冬，病雖尚未全好，但根據地方和部隊共同的決議，我遂毅然入伍。

由於事物的辨證發展，一九三五年秋的要求診治，在質量上與過去不同，我想詳述一下它的過程。

根據三個原因，遂決意要求治療：（一）我的病至一九三五年為止，已經過了十餘年，由於我根本上絕對相信辨證法，所以我對我的病的發展，勿寧是對於質的變化非常憂慮，我怕百病併發。（二）一九三四年冬，曾託牛耕野在濱江買藥，同時詢問一下對此病的診斷，據謙信洋行（拜耳大藥房推銷店）醫生說，這種病大體分為三期：第一期十年，第二期五年，第三期五年，到第二期就不容易治了，如至第三期就幾乎沒有醫治的希望。據此我的病已轉入第三期，不易治好。（三）對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資本主義世界現階段的特質，我有着絕對的信念，即東北抗日運動一定能取得最後勝利。雖然認為與其他殖民地絕對不同，但從當時形勢來看，我想必然要經過比當時更為困難的時期。因此如果病治不好，還遇到這困難時期，恐